

# 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 境界的解构或再构

[韩]金惠俊

内容提要 史书美和王德威提出华语语系文学,主张“众声喧哗”“反离散论”“反中国论”“后遗民论”“势的诗学”,即承认华语语系文学具有的独在性、独立性,以与大陆文学对等的资格来重新定义两者间的关系。他们的观点相差最大的地方在于史书美认为华语语系文学应将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在外”,而王德威则主张将其“包括在外”。简而言之,他们试图重新定义华语语系文学与大陆文学两者间的关系,重构包括这两者的“广义的中国文学”的版图和范围,这其中当然还包括掌握话语主动权的意图。华人华文文学原来具有少数文学的性质,在有关世界文学或文学本身的新的对策这一点上,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而论者似乎过于沉没在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上。

关键词 华语语系文学 华人华文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 史书美 王德威

## 一、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提出

“华人”这一表述具有多种含义。今天通常指汉族(以及像满族这样被汉族同化或与汉族文化具有一体性的人),特别是其中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外地区的人。“华人文学”是指华人的文学,“华人华文文学”是指华人文学中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

中国大陆学界对华人华文文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后,从1993年开始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以及华人华文文学统称为“世界华文文学”。中国大陆学界的世界华文文学(或者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华人华文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完善之处仍然可见。不同学者分别提出境外华文文学、大陆外华文文学、跨区域华文文学、国际华文文学、汉语文学、世界汉语文学、华语比较文学、汉语新文学等多种不同的表述和概念也是出此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中心主义(或者大陆中心主义)视角,试图将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以及华人华文文学看

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sup>①</sup>

大陆以外地区的华人作家或者研究者不一定支持大陆学者的这种态度。其中,近十几年来最受关注的学者是UCLA的史书美(Shu - mei Shih)、哈佛大学的王德威(David Der - Wei Wang)等。史书美在2004年提出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并作出了如下定义。

“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指称中国之外各个地区说汉语(Chinese - speaking)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literature written in Chinese),以区别于“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出自中国的文学(literature from China)。<sup>②</sup>

她还批评了过去对华语语系文学一直以来被忽视或边缘化以及不加选择性地、出于意识形态目的地或者任意地编入中国文学史中的现象。此后,她继续将此想法深入展开。虽然她不是最初使用“华语语系”这一表述者<sup>③</sup>,但是她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定义与范畴,以及具体内容和理论,仍然非常值得关注。

王德威是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文学这一理论

的最积极响应者,并将此理论引介到学界成为当前主要议题。王德威的观点与史书美基本一致,但仍然存在很多细节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还不断进行实践与组织促进活动,利用个人在学术上的权威与影响力,使学界对华语语系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关注与反响。比如2016年10月在哈佛大学以“Sinophone Studies: New Directions(华语语系研究:新方向)”为标题举办了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并且,最终确定“Sinophone literature”的汉语音译表述为“华语语系文学”者,也是王德威。<sup>④</sup>

史书美、王德威等主张的华语语系、华语语系文学、华语语系文化、华语语系社群、华语语系研究等概念和范畴,在过去的10多年间不断发生变化。这一主张的提出者自身有时也不能自圆其说,意见互相冲突。对这些主张表示关心或持批判态度的人,特别是大陆学者们,意见更是多种多样。从乐观的角度看,这是与华语语系文学相关的一切问题在向前发展。从相反的角度看,这表示华语语系文学理论尚处于不健全、不完善的状态。即使如此,但仍然可以梳理出华语语系文学主张的一定脉络以及具体的争论焦点。

## 二、华语语系文学的内容主张

### 1. 华语语系的概念与华语语系文学的范畴

如前所述,2004年史书美对华语语系文学做出的定义比较简单。当时她的华语语系文学言论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汉语(Chinese)”与“中国以外(outside China)”这二要素。此后,她就此问题更加积极地做出了说明。

史书美认为华语语系文学中使用的语言,汉语(华语)<sup>⑤</sup>的概念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汉语概念。恐怕仅凭此一句言论,难解其意。她的主张大概可以做这样的展开。中国的汉语从广义上也可分为7大方言,但却通常被看作一种语言。<sup>⑥</sup>另外进入20世纪以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确定的标准汉语,即“国语”或“普通话”又成为整个汉语的代表,甚至到现在也会出现误认为普通话就是汉语的现象。但实际上除了这种推广性的语言——普通话——以外,相互不同种类的汉语在过去存在

过,如今也仍然存在。不同种类的汉语方言甚至达到互相不能沟通的程度,事实上与不同语言没有分别。因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者 Victor Mair 就认为,在语言学层面上标准汉语只是属于汉语语族,所谓汉语“方言”实际上是不同的语言。<sup>⑦</sup>再说,汉语不是一种语言而是由一些不同的语言构成,汉语不过是这些语言的统称。并且,从大陆移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华人从一开始就将自身的出身地区或出身社群的汉语作为母语使用。不仅如此,他们在移居地繁衍后代,在长期的移居生活中受到具体生活环境的影响,原来的语言自身也出现多种形态的变化,形成混种性语言(即混种性汉语)。<sup>⑧</sup>因此史书美认为不管是在大陆内部还是大陆外部,提倡汉语/普通话/国语,实际上将互相不同的各种汉语分支看作一种语言的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史书美的这种批评自然引起争议。到底应该按照通常的观念将汉语的7大方言以及其下分支全部看作一种语言,还是如 Victor Mair 所主张的那样看作多种语言,这要待学者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只是史书美表示,为了消除对于汉语的误会或是混淆,提出华语语系这一表述是紧迫课题。华语语系这一表述的创造,在使汉语从一种同质化语言的通常观念中摆脱出来,使人们认识到汉语是多种语言的集合这一问题上,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史书美首先试图从语言学层面来解释华语语系这一表述。但是存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使用这些各种汉语方言的不同社群的“发声”问题。她所说的华语语系是指与单一概念上的汉语(或者标准汉语)外观相近,但实际上是互不相同的各种汉语方言的统称。问题是使用不同方言的人,通常经历着不同的生活,具有不同文化和文学。因此,不能单纯地将这些相互不同的社群看作使用汉语的社群或者所谓中国人的一个一统社群。史书美正是在此逻辑的延长线上将使用各种汉语方言而非汉语(或者标准汉语)的社群称为华语语系社群,将他们的语言、文学、文化等称为华语语系语言、华语语系文学、华语语系文化,将有关这一切的研究称为华语语系研究。

王德威积极赞同史书美的这一构想,几次都对史书美华语语系概念的提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果我们以史书美的著作《视觉与认同》为坐标,我们就可以画出当代华语语系话语的大概谱系。……史书美教授使这一谱系的辩证性更加深化。”“面对以上各种论述,我以为史书美教授提出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或华语语系多重论述,首开华语语系研究新局,必须给予最大肯定。而在她的专书之后,我们也可以思考不同的研究策略。”<sup>⑨</sup>即史书美华语语系问题的提出是在继承华人前辈学者观点的基础上,使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也对其他学者新思路的形成构成了影响。<sup>⑩</sup>

在此思想基础上,他特别将“Sinophone literature”译为“华语语系文学”。王德威曾多次在不同地方就此翻译问题申述过自己的观点,他的解释可以概括如此“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可以译为“华文文学”,但是“华文文学”这一词长久以来已经被指称广义的中文书写作品,进一步说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域外文学的总称。不仅如此,这一词隐喻着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延伸到大陆以外边缘地区文学的意义,即“中国文学=正统=中央,华文文学=延异=边缘”的意义。同样的道理,“Sinophone”这一表述可以译成“中文/汉语/华语/华文”等,这里已经内含着汉语是一个一统的语言的意义乃至成见。为了摆脱这些既成观念,需要一个新的表述,其结果就是“华语语系文学”。

王德威非常具有战略性地提出将“Sinophone”译为“华语语系”,将“Sinophone literature”译为“华语语系文学”。但汉语中“语系”一词是指“family of languages”,因此“华语语系”从学术角度来看就显得不那么严谨,在概念上也可能引起混淆。<sup>⑪</sup>即使如此,史书美仍然积极赞同王德威的这一提议。她最初在2004年就已经将“Sinophone”并称为“Huayu”。而“Sinophone”意味着各种汉语类型,“Sinophone literature”强调的是使用各种类型汉语创作文学作品的多音性(polyphonic),因此她认为王德威提出的“华语语系”正好含有这样的意义。<sup>⑫</sup>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王德威积极支持史书美华语语系概念的提出,并进一步扩展华语语系问题、扩大华语语系问题的影响力。不过王德威对华语语系问题的理解,与史书美的角度略有不同。史书美所提出的华语语系问题,主要是从语言学层面对这一表述进行概念上的解释。此后,她又将自己的这些观点进行整理,从多语性、多音性、多字性等方面强调华语语系概念与汉语概念的不同。<sup>⑬</sup>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者说从其重要性角度来看,华语语系问题的核心不单纯是语言学层面的问题。事实上史书美或王德威的真正意图在于批判中国(或者大陆)通过强调中国人(或者汉族)的概念将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同质化、整体化的行为。特别是他们拒绝中国对华人的国家主义乃至民族主义的行为。那么,这一问题就可以从社群的发声这一问题的角度再梳理。他们认为,汉语并非是一种语言而是由多种语言构成,使用相互不同语言的人属于不同社群。因此使用中国人(或者汉族)这一名称强制性地,将所有的汉语使用者同质化、整体化的行为是不正当的,这是强行阻止各个社群使用自身语言发言的行为。史书美和王德威提出华语语系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与中国相关的各社群的发声问题。并且,王德威在此社群发声的问题上,较之史书美还要更加积极努力地试图扩大其适用范围。

许多中国学者(或者大陆学者)总是框囿在所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下,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以及散在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文文学几乎总是处于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状态。王德威作为一直以来不断批判这种现象的华人学者中的一位,在此基础上更向前迈进一步,指出华语语系社群的发声问题不仅适用于大陆外部,而且也适用于大陆内部。华语语系社群的发声问题是使用各种汉语类别、相互不同社群的发声问题。因此华语语系不仅适用于以汉语为代表的大陆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性的发声,也适用于与此不同的其他所有种类的发声。他指出不管是像阿来(母亲藏族,父亲回族)、张承志(回族)等大陆内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还是像苏童(苏州)、王安忆(上海)、贾平凹(陕西)、李锐(山西)、张炜

(山东)、韩少功(湖南)等表现大陆内部各地区声音的文学都应该包括在华语语系文学中,并且适用于大陆外部时其范畴也可以无限扩延。不仅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的作家用华文创作的作品,而且他们使用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也可以被看作是华语语系社群的发声。比如王德威就曾提出过使用英语进行创作活动的哈金(Ha Jin)、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等华人非华文作品是否也应该被包括在华语语系文学之内的问题。近来他甚至提出因为大陆内部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主流性的”汉语文学(即“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使用汉语者的互相不同发声中的一个,因此应该被纳入华语语系文学范畴之内。<sup>⑭</sup>

王德威的这些见解在很多方面与史书美的见解不同。两位学者最大的差异可以说是外在的范畴层面,则华语语系文学应该包括中国大陆文学还是排除的问题上。王德威从2006年开始就主张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之间需要对话,提出应该将大陆文学“包括在外”<sup>⑮</sup>。换句话说,他是在暗示中国大陆文学虽然不是立刻就被包括在华语语系文学之内,但是将来迟早应该包括进来。如此一来,不仅是内陆以外的台湾和香港文学以及华人华文文学,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内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地区性的汉语文学、大陆以外的华人非华文文学也将逐次被纳入到华语语系文学中来,最后就连大陆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主流性的”汉语文学也都会被包括在内。

也许史书美也受到了王德威主张的影响,史书美在其理论的延长线上也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2004年,史书美只将中国大陆以外的台湾文学、(回归前的)香港文学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文文学定义为华语语系文学。<sup>⑯</sup>到了2007年,史书美所主张的华语语系文学虽然仍然主要指中国大陆以外的这些文学,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有意将中国大陆内部少数民族使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也看作是华语语系文学。<sup>⑰</sup>最终,史书美宣布华语语系文学包括大陆以外的台湾文学、(回归前的)香港文学、世界各地的华人华文文学以及大陆内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sup>⑱</sup>即使如此,与王德威不

同的是,直到现在她仍然坚持华语语系文学应该排除中国大陆文学的主张。简单地说,她的态度就是将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在外”。

## 2. 关于“中国”的阐释与对于中国性质的判断

史书美与王德威之间的差异最终还是在于从什么观念出发看“中国”“中国人”“汉族”“华人”以及作为华人他们怎样定义和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的问题上。更简单明了地说,二人就是在如何解释“中国”的概念上出现了差异。

“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可以看作华语语系文学的一部分。”<sup>⑲</sup>“蒙古人、满人、藏人和许多其他中国境内的民族都会说多种语言。不论是自愿学习或外在强加,就他们能以汉语交谈和书写而言,这些少数民族即是华语语系社群的一份子。”<sup>⑳</sup>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史书美所指称的“中国”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她认为这种作为近现代时期政治实体的中国(清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将领土内的非主流即少数者边缘化。随之产生的标准汉语(文言文、官话、国语、普通话)与使用标准汉语创作的文学就成为了正统语言,正统文学。同时大陆内部的多种语言社群的语言和文学就成为非正统的,从而被遏制和边缘化。在她看来,这种现象对于移居中国以外世界各地的华人也是一样。

史书美的这种观点从提出华语语系文学问题开始就被包含在其中。她曾经说过当时自己是参考了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等术语,创造了华语语系这一表述。<sup>㉑</sup>众所周知,英语语系这一术语是指英国的英语扩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使用英语的多语种地区。虽然这些地区的英语与英国的英语不完全一致,但也可以看作是同一类语言。随着后殖民理论的扩散,这一术语却逐渐被注入了新的概念。殖民宗主国强行要求被殖民者学习他们的语言,殖民时代结束后被殖民者也仍然在使用殖民宗主国的语言,被殖民者的语言开始以混种或模仿的形态来反抗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或将这种语言变形化。换句话说,在这一术语的使用中包含着与帝国和殖民地、殖民支配和被殖民支配、霸权主义的压制和对压制的反抗相关联的视角。因此,史书美参考

这样的术语创造出华语语系就意味着她也是认为中国(大陆)对待台湾、香港、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以及大陆内部的少数民族的态度。

此后,史书美在其论文中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这种见解,<sup>22</sup>她使用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sup>23</sup>她还主张在台湾、新加坡等华人社群居住地、移居华人(汉族)在当地实行了一种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这些地区移居者的情况类似于支配过原住民的美国或加拿大。

王德威所指称的“中国”与史书美不同,不是政治实体上的中国而是其它概念上的中国,他所指称的中国主要是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中国。对此,他通过详细介绍复旦大学葛兆光的主张来代替自己的解释。<sup>24</sup>根据葛兆光的见解,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中国”不是虚构的存在,而是以汉族与汉族文化为核心历经长久时间形成的存在,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逐渐转变成民族国家的形态。<sup>25</sup>王德威正是从这样的观点上看待中国,虽然有时也直接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指称中国,但主要还是使用广义上的中国概念。

从王德威在多处间接说明上看<sup>26</sup>,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是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实体的。他所想象的中国从地理上看不仅包括中原地区,也包括西藏、新疆,还包括台湾、香港等(这与史书美不同)。如果从种族或者文化社群上来看,不仅包括中国大陆的汉族以及少数民族,大陆以外的台湾人、香港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包括在内。因此,王德威主张中国文学也应该从广义上不仅包括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还应该包括华人的华文文学以及更进一步到华人的非华文文学。换句话说,不管是今天的大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性质的文学,还是与之相区分的大陆内部的多种发声的文学,或是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世界各地华人的文学都应该包括在中国文学之中。因此,他常常使用“广义的中国文学”这一表述。

王德威认为以汉族以及汉族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上的中国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存在。他主张不管是“华语语系文学”还是“中国文学”,或者不管是“最终华语语系文学”还是“广义的中国

文学”被包括在此范畴里的文学都不能变成被同质或等质的存在,而应该成为存在多种发声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文学。

### 3. 史书美的反离散论、反中国论与王德威的对话论

如此看来史书美与王德威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主张事实上就是关于华语语系社群的主张,他们曾经从华语语系语言和华语语系文学出发的言论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向华语语系社群和华语语系研究的方向转型。

史书美反对将华人看作离散者,因为这样会使华人受到来自居住地国家的异质化和边缘化、出发地国家的同质化和边缘化的这种双重支配模式更加牢固,华人因此永远无法摆脱这两者的压迫与支配。她反对作为政治的、种族的、文化的源泉或者根的中国,主张华人只有在现在与在地这具体的时空间里彻底地适应居住地才可以结束离散者的状态。<sup>27</sup>到了那个时候,华语语系社群的状态也随之结束,华语语系语言、华语语系文学、华语语系文化也逐渐消灭。<sup>28</sup>

王德威的看法与之不同。他认为今天有可能从新的角度提出华语语系问题与“中国崛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耶鲁大学的石静远(Jing Tsu)提出的“Sinophone governance”战略更为凑效,即华语语系社群的优点是可以适当地利用中国与居住地两地的资源,由此来确立华人的地位才是更有效的方法。<sup>29</sup>因此,王德威主张华人没有必要为了摆脱离散状况而毫无意义地与中国断绝关系,反而需要与中国对话。

王德威的这一主张颇有道理。依我看,首先华语语系社群与中国彻底断绝关系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如此,假使华人为了断绝关系而不懈努力,这些华人移居者是否可以获得居住地主流社会的信任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新型华人移居者不断出现。<sup>30</sup>也许有人会说,即使面临这些困难,华人移居者及其后代在特定时期里彻底地获得作为居住地居民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但是即使如此,那将需要非常长久的时间。况且,像在华人占主流的新加坡地区,华人的获得居住地身份认同与华语(或者在各种汉

语意义上的华语语系语言)会消失的断言是不是显得有些牵强了呢?另外,在史书美的分类上也属于华语语系地区之一的台湾人(汉族)如果获得了台湾的身份认同,那么台湾华语语系语言(即汉语)就会消灭吗?从这些问题上来看,史书美主张的方案在现实问题上就显得没有效果或者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总之,史书美的上述主张可以称为“反离散论”与“反中国论”。这两者存在密切关系,其中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要素。按照她的主张,比如像台湾,就会成为与中国毫不相干的地方。最早定居台湾的人是台湾的原住民,到了17世纪第1次大规模的汉族移居者(本省人)对原住民进行统治。日帝殖民时期之后的20世纪中叶,第2次汉族移居者(外省人)对台湾原住民和本省人进行统治,现在中国(大陆)力图实现统一。如果反离散论和反中国论适用在这里,台湾的华语语系社群(原住民+本省人+外省人)则彻底地与中国断绝关系实现在地化,意味着只有台湾的独立才是最合理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合乎历史与现实。

但是王德威与此相反,他强调华语语系文学与大陆文学之间的对话,而尽量避免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对史书美机械地将回归前的香港文学划分为华语语系文学,将回归后的香港文学划分为中国文学(大陆文学)的做法提出疑义,他认为她的见解与政治地理观念过于纠缠不清。他主张比起政治实体上的中国,更应该优先考虑历史文化上的中国。从战略意义上讲,他的这些主张对于将华语语系文学范畴最大化、将华语语系文学主张的影响力最大化是非常有利的。

4. 史书美的地域性与跨国性,王德威的“后遗民论”与“势的诗学”

即使如此整体地看,主张华语语系的史书美和王德威之间就中国与华人的关系问题所持观点仍然存在很多共同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点。第一,虽然各自提出的方案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使华人摆脱来自出发地和居住地的双重支配,通过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来结束离散状况。第二,华人已经各自在居住地扎下了根或者将要扎根,从这一点出发,就应该摆脱中国是源泉或根而

华人是支流或枝叶的观念。第三,关注理解和表现这种华人社群特征的“华语语系言述”,并更加积极地探讨和扩展。史书美和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也是从此基本意识上出发,并各自赋予了不同的性格。

史书美在自己对中国与华人的基本意识上,曾主张华语语系文学既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跨国性、既具有流动性也具有开放性的性格。<sup>①</sup>她认为,华语语系文学因为是与特定时期、特定地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学,所以是地域性的。即使作品中出现对中国的想象或乡愁,但它仍然是地域性的。因为作家已经离开了出发地中国,在现在的居住地才会表现出这样的想象。同时华语语系文学是跨国性的,因为作家散在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各个华语语系社群的移居经验与政治文化情况互相不同。<sup>②</sup>另一方面,华语语系文学是流动的。因为华语语系社群是变化的社群,终将与居住地完全融合成为居住地的成员,因此华语语系语言的使用也将终止,华语语系文学的创作也将结束。华语语系文学是开放的,因为华语语系语言使用者的文学,与他们的国籍或种族无关。因此,史书美反对大陆学界将中国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的关系比喻成根与枝、源泉与支流。

王德威就此问题也持同样看法。他也像史书美一样反对根与枝、源泉与支流的比喻,只是他认为不管是大陆学界对根的强调还是史书美对根的反反对结果都纠缠在对“根”的想象上,需要找到另一种方式的解释。因此他提出可以参考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根茎论(theory of rhizome)”或者斯图尔特·霍尔的“根/径(roots and routes)”论,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创造的“后遗民论”与“势的诗学”。<sup>③</sup>

根据王德威的理论,华语语系文学中出现了作为跨国移居者的“移民”,随着在地化而改变身份的作为外国人的“夷民”,仍然眷恋出发地中国的“遗民”,这三种声音即所谓的“三民主义”现象。但这还不是全部。大陆以外的华语语系社群为了确立各自在居住地的文化合法性,试图通过想象创造一个已经失去或者消失的因而回不去的中国。换句话说,大陆以外的华语语系社群正在

为未来的自己创造一个过去的中国。但是这样的中国未必是正统的中国,甚至未必是实际上存在过的中国。王德威将此现象称为“后遗民”现象,认为华语语系文学应该从这一视角来看待。

对此他没有具体举例说明,但是通过他的理论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称自己掌握着中国的正统性;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的居民也仍然保持着中国文化或中国民间文化;移住东南亚的华人尽量保持着各自从出发地带来的文化,他们反复回味着出发地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再创造;马来西亚华人作家中的一部分为了寻找中国正统性而来到台湾,但是他们因为没有找到自己想象的中国而苦闷;移居北美的一部分华人作家认为自己虽然身在中国外部,但是在文化上却存在于中国内部,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性的继承者或者发扬者……等等。

另一方面,王德威认为大家一直以来主要根据政治的位置来看待华语语系文学,但如今应该摆脱那样空间的、静态的态度,而采取时间的、动态的态度。在他看来,不管是大陆学界还是华人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处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居住地主流之间的华人终究与中国持有何种关系。前者试图将华人纳入中国的所属之内,后者因而不得不试图与华人分隔开来。这种试图,压缩起来看就是内/外、包括/排除、定居/离散、敌/我、中心/边缘、综合/分离等等的概念。但是说严重一点的话,这些观点都没有摆脱冷战逻辑的范畴。<sup>③</sup>因此,在他看来现在不是什么位置和立场的问题,而应向着重视什么趋势与动机的方向转变。就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而言,应该在承认相互间的间隔与距离的基础上,不是站在主与客的立场,需要相互间的对话与比较,这就是“势的诗学”。

史书美与王德威等提出华语语系或者华语语系文学,主张多声主义、反离散论、反中国论、后遗民论、势的诗学等,有着使这些理论扩散的共同目标,这是为了使华语语系文学具有独立性、独特性并进一步得到认可,以对等的资格确立与大陆文学的关系。但是,深入探究他们的主张和逻辑,就

会发现其中潜在着更加远大的目标,这就是华语语系文学没有停留在拒绝被大陆中心主义边缘化上,而是最终希望将大陆的文学纳入“广义的中国文学”版图与范畴的再构上,比如再确立华语语系文学与大陆文学两者的关系,再建构包括两者在内的“广义的中国文学”的版图和范畴,在此过程中,当然包括掌握话语主导权的意图。<sup>④</sup>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则会发现他们的目的乃至意图,即通过导入华语语系的概念,在对历史文化上的“中国”的想象问题上掌握话语主导权,甚至在对于政治实体上的“中国”的想象问题上也是如此。

### 三、华语语系文学理论的意义

如上所述,如果考察从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到华语语系研究的转换之一系列主张,就会发现确实存在某些基本的脉络和相通要素。其中最明显的是关于中国和华人关系的政治立场,以及关于中国与华人观念的学术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一概念,因为对“中国”理解的不同会使很多要素随之不同。

从广义上来看,将中国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清国等政治实体,或者主要看作以汉族和汉族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中国与国外地区、中国人与华人的范畴就随之不同。但是反过来看,今天关注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本身已经说明中国不是一个一统的概念,那些被想象成的中国的共同体也不是一个一统的共同体。从这一点上来看,华语语系文学提出者的问题意识的确应该给予关注。他们一直以来强调不管是在中国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着相互不同社群的声音,从语言、文学、文化到种族、民族、社群的身份认同上提出多种问题,同时还努力就此问题做出回答。

依我看,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跨国移居者文学的一部分的华人华文文学,以及与其在范畴上存在很多交集的华语语系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严格地说,华人华文文学或是华语语系文学并不是加塔利与德勒兹所定义的少数文学,但是它们都对主流文学带来冲击、对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版图,具有改变文学自身的潜力。因为华人华文文

学(更进一步说是跨国移居者文学)所具有的特征本身,不仅展现了作为新型人类社群的移居者的生活,而且正是为了表现这样的生活的文学在内容到方式上都发生了某种变化,更进一步说也不无改变文学自身的可能性。<sup>③</sup>

但是,华语语系文学的主张似乎至今仍未完全发挥出其潜力,虽然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倡者提出了非常具有挑战性和挑衅性的观点,并利用大量的理论资源和例证来证明其正当性和可能性。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疑点,至少在短时间内似乎拿不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也许是因为学者人力资源不够充分,也许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论。从这一点上来看,华语语系文学主张是非常具有可能性的提议,在此期间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应该视为发展中的理论较为合适。就此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认识。

史书美提出反离散论,主张华人应该通过彻底的在地化成为居住地社会的一员,到了那个时候华语语系语言将会消失。那么在这种彻底的在地化过程中,华人应该继续保持出发地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还是应该与其彻底断绝关系?如果是前者,那么到中断使用华语语系语言为止,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如果是后者,那么与中国彻底断绝关系可属易事?另外史书美提出华人应该自发地选择彻底的在地化,这实际上难道不是在将居住地社会的巨大压迫正当化?是否在将居住地社会的同化主义或以其变形形态存在的多文化主义正当化?

史书美和王德威主张大陆内部的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是华语语系语言,他们的文学是华语语系文学,这意味着大陆不是以汉语(或标准汉语)统一(一体)的。如果是这样,史书美将大陆和大陆内部华语语系社群设定为二元对立,在逻辑上是否矛盾?即大陆内的华语语系社群为什么不被同时包括在大陆?是否因为逻辑上的悖论而回避详细言及大陆内部华语语系文学的问题?另外,他们将华语语系社群看作是多种发声社群的集合体,即使各自的处境是如此,但是将多种社群大统合构成一个巨大的想象的共同体合力与大陆相抗衡,这在理论上是否真的可行?假使在理论

上可行,那在现实中又是否可行呢?那么,与华语语系文学或华语语系社群相关的主张到底是在反对什么?

依我看,如果上述这些疑问不断出现,就说明这不是单纯的逻辑问题或是理论展开上的问题。从根本上来看,既是因为从身份认同的政治这一观点出发而产生的问题,也是因为华语语系文学的定义自身太单纯或存在不足。对于后者再加说明的话,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者主张汉语是多种语言的集合,广义上看可以分为标准汉语和各种汉语方言,其中使用各种汉语(华语)方言的作家的书面语是华文,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都是华语语系文学。但是在定义某个人类社群文学的时候,单纯使用哪种语言这一个标准是否不太恰当?因为某个人类社群在文学中使用的语言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社群的生活本身。如果将这一点适用在华语语系文学中,通过提出华语语系(华语/华文/各种汉语)语言,只强调不是标准汉语而是各种汉语的方言共同性,而这些语言使用者的多种发声,即多样的实际生活却反而被遮盖了。特别是,华语语系文学主张的根本性问题意识不是语言自身,而是从所谓的华语语系社群“发声”问题中而来的观点,更是不能自圆其说。

让我们来假设一个极端的例子。史书美曾说“华语语系社群也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因为它不是由说话者的种族或国籍所定义,而是由说话者所讲的语言所定义。”<sup>④</sup>近来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越来越多,因此在中国出生的第2代中开始出现了第1语言是汉语的韩国人。那么汉语属于第2语言的父母一代,汉语属于第2语言的子女一代,以及新登场的汉语属于第1语言的子女一代,这三个社群都应归属华语语系社群,还是应该将其中的一部分归属于华语语系社群?如果是前者,各个社群在华语语系社群内部属于同一社群还是不同社群?如果是后者,为什么有些人被归属于华语语系社群而另有些人却不是?另外这些人中如果有人使用汉语(华文)创作,其文学将被交叉或甄别性地包括在华语语系文学、中国文学、韩语语系文学(参照将华文英文作家哈金的作品也纳入华语语系文学中的王德威的见解)、

广义的韩国文学中,那么这样的分类又具有多少实用性和意义呢?更重要的是,这两代韩国裔大陆移居者的生活究竟有多大差异而值得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区分呢?如果一定要将其范畴化,是不是不能只凭借语言这一种标准将其分入不同社群,而应该以他们的整个情况为基础进行范畴化呢?即是否应该与朝鲜族相区分,将中国内的韩人社群视为一个新的社群呢?

华语语系文学提倡者选择和坚持使用这样的定义,一定有他们的战略性理由,即使用华语语系语言这一最小公约数而力求最大范围地构建华语语系文学或华语语系社群的范畴并引起广泛注意。但是使用标准汉语以外的各种类别汉语这唯一的标准来定义华语语系文学,其范畴就难免会过分扩大,其特征就难免会过于复杂。其结果是具有不同特征的许多人类社群的文学都被包括进来,随之需要更加复杂的说明,有时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前后矛盾的逻辑。这种尴尬局面很可能是由于华语语系文学提倡者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各自再调整华语语系文学范畴而造成,又或者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关注而在为扩散其主张的努力过程中而出现,甚至是由于不管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有人提出挑战性主张,而有人又在扮演缝合者的角色时而产生。不管怎样,现在难免出现包括上述情况在内的各种忧虑。

华语语系文学(特别是其中的华人华文文学部分)在具有少数文学的特征上,对于世界文学或文学自身的新的提案方面都具有相当的潜在力量,但是或许提出此主张的人过于沉浸在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上,换句话说,不管是主张排除中国还是包括中国,他们都过于重视华语语系社群与中国的关系;或者不管是主张与中国断绝还是与中国对话,他们的主张都还只停留在中国的向心力和华人的离心力这一思维范畴中进行。这样的结果就是,不要说他们所希望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解构不会实现,他们反而有可能在为形成更大的中国、建构更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而努力。史书美认为作为新的想象共同体的“华语语系社群”与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史书美在现今的

全球网络中排除了与这两者相关的其他一切要素,其结果就是很可能构成一个更大的范畴、更大的中国。再加上王德威一再强调“广义的中国”概念,其表现很温和但却在不自觉中给这一巨大范畴赋予了名称,而这样更大的中国或是“广义的中国”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他们所担心的存在,这是因为在现实意义上所谓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强烈的实体本就存在,在抽象意义上所谓的中国这一非常具有伸缩性历史文化观念也确实存在。

①以上论述参见了金惠俊《试论华人华文文学研究》,《香港文学》第341期,香港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世界华文文学在理论上包括中国大陆的汉语文学,但实际上并不涉及。包括此问题在内,有关华人华文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的详细论述参考该论文。本文在以下的内容中均将“中国大陆”简称为“大陆”。

②⑬⑭⑮ Shu - 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19, No. 1 (2004), p. 29, p. 29, p. 29.

③据陈慧桦所述,Ruth Keen 1988年已经使用“Sinophone communities”这一术语,企图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的中文文学包括在内。参见陈慧桦《世界华文文学: 实体还是迷思》,《文讯》革新1993年第52期。

④“Sinophone”的汉语翻译除“华语语系”以外,还有“华语风”(陈慧桦、“华语”(史书美、“华夷风”(王德威、“汉声”(刘俊)等多种,这表示出人们对华语语系文学以及华语语系研究的不同观点。

⑤史书美在英文论文中使用 Hanyu (Chinese)、Zhongwen (Chinese)、Huayu (Sinophone)、Huawen (Sinophone)、Sinitic languages 等,在中文论文中也根据语境的不同混用汉语、中文、华语、华语语系等。

⑥史书美也曾提出过汉语在广义上包括8大种类,这可能只是她的失误,也可能是她在7大方言上加上了标准汉语(国语/普通话)。参见 Shu - mei Shih,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26, No. 3 (2011), pp. 709 - 718.

⑦⑧⑨ Shu - 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98, p. 53, p. 60.

⑧比如主要是山东出身的韩国华人,虽然接受过标准汉语(国语/普通话)教育,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讲山东话,而且他们的韩国式山东话与现在中国的山东话也不尽相同。详见史书美《视觉与认同: 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5-56页。她在近期还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华语所写成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是如何地受到了藏语、蒙古语、泰语或阿拉伯语的深刻影响,许多词被音译或翻译成普

- 通话 大大地殊异化了中文的书写系统。”详见史书美《何谓华语语系研究》,《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9卷第2期。
- ⑨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 ⑩王德威举例所说的关于中国性和华人的各种华语语系话语包括如下内容:杜维明的“文化中国”,王赓武的“中国性的文化光谱论”,李欧梵的“游走的中国性”,王灵智的“双重统合结构”,唐君毅的“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周蕾的“中国血统的神话”,洪美恩的“就是不会说中文”,哈金的“流亡到英语”,葛兆光的“宅兹中国”,石静远的“Sinophone governance”,黄锦树的“马华文学的驳杂性”等。
- ⑪朱崇科(朱崇科《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黄维梁(黄维梁《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等一些学者就此提出疑问,因此王德威曾在多处为自己的观点辩解。比如他在与李凤亮的对话中说,“华语语系”的“语系”其实比较接近于“family tree(系谱)”的观念,为了强调使用华语社群的多样性和所使用语言的多样性,同时也为了强调华语这个公分母而有意选择这个词。详见李凤亮《“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花城》2008年第5期。
- ⑫⑬⑭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9、58、269页。
- ⑮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对台湾文学的可能意义》,《中外文学》2015年第44卷第1期。
- ⑯以上叙述参见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李凤亮《“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花城》2008年第5期。王德威曾说“如果真要把‘华语语系’的观念推广到中国大陆时,就不必只汲汲于那个政权的代表性而已……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大陆境内的汉语/中文就是华语语系的一部分。”详见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史书美也随后指出“所谓的华语社群,应该指的是说普通话/国语、广东话、福建话、客语、潮州语等等语言的社群的总合。”详见史书美《何谓华语语系研究》,《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9卷第2期。
- ⑰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 ⑱⑲史书美《何谓华语语系研究》,《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9卷第2期。
- ⑳参见 Shu - mei Shih, “Theory, Asia, Sinophone”,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3, No. 4 (2010); Shu - mei Shih,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26, No. 3 (2011);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赵娟译,《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史书美《何谓华语语系研究》,《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9卷第2期。
- ㉑史书美因为中国的这种内部殖民主义与西方的海外殖民主义存在不同,因而称之为大陆殖民主义(continental colonialism)。
- ㉒参见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
- ㉓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8页。
- ㉔王德威回避直接言论这些敏感话题,只限于通过上下文可以推测的水准上点到为止。
- ㉕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赵娟译,《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 ㉖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㉗史书美对此态度乐观,比如她说“后继而来的新移民使华语语系的概念继续保持活力,但是移居较久的旧移民则会向主流的方向移动,使主流文化产生异质变化,以冀达到多元性与平等。”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62页。
- ㉘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刍议,或〈弱势族群的跨国主义〉翻译专辑小引》,《中外文学》2007年第36卷第2期; Shu - mei Shih,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26, No. 3 (2011);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赵娟译,《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 ㉙华人华文文学所具有的移居性、双重传统、少数文学性等也与其他移居者社群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一脉相通,因而在此意义上也是跨国的。
- ㉚参见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 ㉛王德威这样说“史教授对‘海外’和‘中国’所作的两个区块的区分,显得过于僵化。……刻意区分中国和华语社群,俨然有了敌我抗衡的姿态,这岂不让我们想起20世纪中期的冷战论述?”参照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
- ㉜王德威的《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2002)可以说是这些努力的实际成果之一。郜元宝站在大陆学者的立场对王德威进行了辛辣的批判:王德威试图扩大和重画自己所想象的华文文学(即华语语系文学)的版图,乱构中外文学史谱系而否定大陆文学的意义和地位。参见郜元宝《“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 ㉝作为跨国移居者文学的华人华文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与少数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参见金惠俊《试论华人华文文学研究》,《香港文学》第341期,香港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简介:金惠俊(KIM Hyejoon),韩国高丽大学博士,釜山大学中文系教授。